

# 徽州历史文献与中国史研究

栾成显

**中文提要:** 既有大量的文书档案, 又有丰富的典籍文献, 是徽州历史文献的一大特色。徽州历史文献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 既有地方性特点, 又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一面, 对于研究同时期的中国历史, 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 开展中国历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等, 均有重要价值。徽州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无疑是合乎 20 世纪以来学术发展先进潮流之举。徽学研究的发展, 将大大突破传统国学以文献证文献的局限, 开辟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徽州历史文献 徽州文书档案 徽州典籍文献 徽学

展望 21 世纪史学研究的发展, 不能不对 20 世纪学术界的历程进行总结。同样, 探讨徽州历史文献与中国史研究这一课题, 也必须对有关的学术史作一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史研究, 可以说取得了飞跃性的巨大发展。促成史学研究这一巨变的因素很多, 但不难看出, 其最主要的, 一是由于理论方法上的革新, 二是由于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的一系列新发现。以后者而言, 20 世纪初即有一系列新发现。其后不久, 国学大师王国维于 1925 年概括出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 同时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 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论断, 他说:

古来新学问起, 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 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 有赵宋古器出, 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 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 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 一为孔子壁中书, 二为汲冢书, 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 自来未有能比者也。<sup>1</sup>

很明显, 王氏的论断, 不但有其时代背景, 即在上个世纪初出现了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系列重大发现, 而且它也是对数千年来学术史的一个总结。与此同时, 王国维先生又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 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 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 惟在今日始得为之。<sup>2</sup>

那么，王氏所说“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指的是什么呢？又为什么说“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呢？以其所述不难看出，所谓“纸上之材料”，主要是指传世的历史典籍、著述编撰等文献记载资料；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既包括考古发掘出土的金石器物，也包括新发现的古书佚籍及古文字资料。从其所举殷虚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内阁大库档册等来说，可看出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文书档案类资料。又，这里既有考古发掘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又有通过其他途径发现的文书档案。在中国古代，文献一语，包含着所有的历史资料。至今广义上的文献含义仍是如此。其后不久又出现文书这一词语。文书一词本来亦有多种含义，既指文字图籍、诗书古籍，又指公文案牍、契约字据、书信手札、遗书写本等等。唐宋以后，所谓文书，渐渐多指官府公文案卷与民间契约帐簿等。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文献之中又渐渐演变出文书档案与著述编撰等一般的文献记载之不同类别。二者在形式上固然有所不同，而其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可信程度上的差异。文书档案乃是官府或民间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原始文字资料，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及文物性质。因此，文书档案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的第一手资料。而一般文献记载，即使是当时人的著述，也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东西，实为二手资料。从科学研究来说，无疑前者价值更高。所以王国维先生说“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这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又，文书档案不只是能对文献记载加以补证，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独自的新的研究价值。王氏所举 20 世纪初殷虚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内阁大库档册等重大发现，均为传世文献记载中找不到的一大批新资料，研究价值极高。故这些新发现都形成了新学问。所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实则是从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国学以文献证文献的局限。不惟道理上如此，学术研究史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上所述，王氏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一论断，就是其对以往的学术史进行总结而提出来的。王氏的论断也被其后的学术研究发展所证实。自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等发现以后，20 世纪以来对其研究一直长盛不衰，都各自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有的成了世界性的显学，对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新发现来说，除考古发掘之外，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面世，当是该世纪历史文献方面的又一大发现。20 世纪徽州文书的面世与发现大致有三个时期，一是 40 年代抗战胜利后，二是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三是 80 年代至今。目前对在藏和已经面世的徽州文书，尚无确切的统计，但据很多学者的调查估算，其已达 20 余万件。现在徽州文书仍在不断发现。若将尚未面世者估算在内，其总量当在 30 万件以上。这也许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从质量方面来说，徽州文书的种类繁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徽州文书类目》为例，共分“3 种，9 类，117 目，128 子目”，其中既有土地关系文书、财产文书，又有赋役文书、商业文书；既有宗族文书、会社文书，又有官府文书、诉讼文书，此外还有科举教育、乡规民约等方面的文书。而这仅是依据该所收藏的一万多件（册）文书所作的一个分类。现在面世的徽州文书的很多种都有相当大的批量，成本成册，且跨越时间长（宋至民国），既可做定量定性分析，又可做连续性追踪考察。所以，徽州文书又以价值高著称。

如众所知，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的文书档案，并不只是在徽州被发现。迄今已知在各省的很多地方，都发现有明清时代的地方文书档案，如顺天府宝坻县清代档案、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土地文书、河北获鹿清代编审册、山东曲阜孔府明清档案、江苏清代商业文书和太湖厅档案、浙江严州府明清土地文书和兰溪清代鱼鳞册、安徽宁国府南陵县档案、福建明清契约文书、四川巴县清代文书档案、四川自贡清代盐业档案、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清代档案、贵州清代文书、珠江三角洲土

地文书、香港清代土地文书、台湾淡新清代档案等等。但这些文书档案，或数量有限，或种类单一，或仅为某一朝代的，在量和质的方面都难以与徽州文书档案相比。举出一个例子。最近，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先生所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该书将一批珍贵的明人手札发掘出来，公诸于世。美国所藏这批明人手札，乃系原件，既属罕见文物，又为珍贵史料。其不仅数量可观，属海内外罕见，而且内涵丰富，涉及明代后期这一变革时代的许多方面。又收信人多为同一人，本系徽州儒商，研究价值极高。而国内目前收藏明人手札最多的是上海图书馆，计 580 余通，且收信人颇为分散，其数量和研究价值都不及徽州文书所藏。应该说，将数量大、价值高的徽州文书，列为 20 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当之无愧。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在徽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徽州文书这一新发现，一门新的学问即徽学也兴起了。这恰是王氏预言的一个印证。总之，数十万件价值极高的徽州文书的遗存，乃是徽州历史文献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

所谓徽州历史文献，包括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文献以及徽州金石文献等。在徽州历史文献中，除文书档案之外，还有丰富的典籍文献流传至今。近来学者统计，历史上见诸著录的徽人著述总数在 7000 种以上，目前存世者尚有 3000 种左右；未见著述的家刻本如族谱等尚有千余种，二者合计现存徽人著述总数达 4000 种以上。这些典籍文献种类繁多，经、史、子、集各类典籍都有丰富遗存。其中，像朱熹、程大昌、方回、朱昇、程敏政、江永、戴震、程瑶田、俞正燮、金榜、汪机、赵吉士等人的著述，实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大家之作，世所公认。更有一批富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乡邦文献，诸如《歙纪》、《歙问》、《歙事闲谭》、《海阳纪略》、《休宁碎事》、《新安蠹状》、《橙阳散志》、《凤山笔记》、《寄园寄所寄》、《珥笔肯綮》等等。再以新安医籍为例，清末以前新安医家所著医籍达 800 余部，现存尚有 300 部左右。而徽州地区遗存的族谱，亦以数量大、价值高著称。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族谱共 400 余部，其中徽州族谱就占一半以上。毋庸置疑，这些典籍文献对于考察徽州的历史文化乃至探索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解读徽州文书档案等，都具有极高的价值，不可或缺。众所周知。文书档案虽属一手资料，但亦有其局限性。遗存至今的文书档案即使达几十万件之多，也只是当时实际存在文书之冰山一角。时至今日，由于数量的限制，很多文书档案虽然真实可信，具体入微，但却难以反映该事物历史发展的背景与全貌，只宜进行微观剖析，不能作出宏观概括。而文献记载则多具宏观性、概括性。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比，实则是各有优长，具有互补性。王国维先生提出的是“二重证据法”，其后又有学者提倡“三重”或“多重”证据法。既然是二重或多重，我们就不能只注意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在实际研究中，必须走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之路。迄今为止，像徽州地区这样，发现有大量的文书档案与文献典籍同时遗存下来，并不多见。既有大量的文书档案，又有丰富的典籍文献，这是徽州历史文献的又一大特色。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数量大、价值高的徽州历史文献保存至今呢？这是偶然的吗？大凡一处历史遗存被发掘，或某地历史资料被发现，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多以该地历史上的经济文化繁荣为其前提条件。在谈及徽州历史文献特别是徽州文书的遗存原因时，一般多强调其属山区、战乱较少这一因素。即所谓“山峭水厉，燹火弗惊”。这的确是徽州历史文献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仅仅是外因条件。从内因来说，大量的价值高的历史文献遗存至今，当是与历史上的徽州经济文化高度发达这一点分不开的。徽州虽为山区，但距杭州、南京等江南中心地区并不遥远，有多条水路、陆路相通，各方面联系十分密切。明代徽州一直属于南直隶，“乃当三辅”，为京畿之地。清初属以南京为省会的江南省，康熙分省后归安徽省，但安徽布政使司仍驻南京，直至乾隆二十五年才移驻安庆。可以看出，宋元以后的徽州地区，虽不像杭州、苏州

那样,处于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最中心地带,但它无疑是属于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江南经济文化圈之内的。史载,徽州在南宋时已是“人烟辏集,无异京华”。明清时期以徽商称雄海内,更加繁荣。在文化方面,“新都故文献地也,隶畿辅而望东南”。素称“程朱故里”、“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其经济文化之发达,足以与苏杭相媲美。正是由于历史上徽州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公私交往频繁,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编撰了丰富的文献典籍,才能有数量大、价值高的徽州历史文献流传至今。而徽州历史文献的大量遗存,反过来也说明了历史上徽州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由此我们则可以进一步明了徽州历史文献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第一,徽州历史文献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既有其地方性特点,同时又有超越地方本身的典型性与普遍性的一面,对于研究同时期的中国史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徽州地近南京苏杭,属京畿之地,明清两代徽州地区则一直比较忠实地贯彻朝廷的政治经济政策,因而徽州文书与文献典籍中所反映的明清社会经济制度,既典型地体现了明清两代朝廷的政治经济措施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同时亦具普遍性。如土地买卖文契、契本、税契凭证、契尾等体现的土地买卖制度,鱼鳞图册、丈量图册、签业归户票等反映的土地制度,户帖、黄册底籍等反映的户籍与赋役制度,十家门牌显示的保甲制度等等。甚至可以说,如今也只有通过对徽州文书的考察,才能对明清时期的一些社会经济制度作更深入的研究,纠正谬误,推向前进。现存其他地方的文书档案,由于种种局限,已很难做到这一点。例如,以往中外学者都将日本所藏一件文书认定是明代的黄册原本而广泛引用,甚至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亦加采用,似成定论。但通过对所藏徽州文书黄册底籍的考察,可知其并非明代黄册原本,只是一份明代保甲文册。<sup>3</sup>又如,美籍华人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认为,“六百年来最为传统及当代史家称道的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并宣称对此进行了“最多面,最缜密”的考证。<sup>4</sup>同作者:《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然而,其考证只是关注了文献方面的有关记载,并未对遗存至今的鱼鳞图册档案文书进行调查与研究。如果对遗存至今的数千部(册)鱼鳞图册文书稍作调查,如果对徽州文书中已不止一部地发现了龙凤时期(元末明初)及洪武时期的鱼鳞图册实物稍加留意,那么,所谓“鱼鳞图册传奇”说,是无需多加辩正的。

徽州本是“文公阙里”。在思想文化方面,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思想对徽州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成为宋代以后徽州社会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与儒家文化是宋代以后徽州的主流文化。元代著名理学家赵汭说:

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家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惟然。<sup>5</sup>

至清代前期,徽州又成为朴学的发祥之地。从朱熹到戴震,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既是宋代以后徽州思想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时它也代表了该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徽州历

史文献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徽州本是一个移民社会。其世家大族多从北方迁来，历史悠久，远肇汉唐，迁徽以后一直保持原有的宗族体系和传统，其风最为近古。宋代以后，徽州宗族极为繁荣，成为中国封建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很明显，研究徽州宗族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的宗族亦具有重大价值。而在徽州历史文献中，既有与宗族相关的大量的文献典籍存世，又有珍贵的宗族文书遗存，更有众多的族谱被保存下来，有关宗族的资料最为全面丰富。这方面的研究极具优势。

如同甲骨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等对说明其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文化都有重大价值一样，徽州历史文献在阐释整个明清时期历史文化方面亦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第二，徽州历史文献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具有重要价值。

有关中国历史的传世文献典籍，虽然极为丰富，但从现代科学研究的要求来说，仍有很大不足。传世的文献典籍记载，多重政治，轻经济；重典章制度，轻社会实态；重纲常伦理，轻社会生活；重王室精英，轻平民百姓。总之，多偏重于上层社会，其记载不厌其繁、颇为详细；而轻视下层社会，其叙述语焉不详，十分简略。徽州历史文献中的乡邦文献特别是徽州文书所提供的资料，则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说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属官府档案，那么徽州文书则是民间档案，记录的是基层社会情况。这也是徽州历史文献的一个特色。它不仅反映了官方制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基层的实际运作与执行情况，而且提供了一大批典籍文献根本没有记载的、有关基层社会的原始档案资料。其对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徽州文书中，既有记载一个图（包括几个自然村）的较为完整的人口与土地资料，又有关于一个宗族或一户的归户性文书。前者如安徽省博物馆所藏四册明代黄册底籍：《万历拾年大造贰拾柒都五图黄册底》、《万历贰拾年大造贰拾柒都第五图黄册底》、《万历叁拾年大造贰拾柒都五图黄册底》、《万历肆拾年大造贰拾柒都伍图册底》，即登载了连续四个黄册大造之年该图的人口与土地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分析当时农村的人口与经济结构无疑是弥足珍贵的。<sup>6</sup>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徽州文书中的归户性文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搜集的徽州文书中，一些原本是属于一户的文书即归户性文书，多被打乱，分别藏于多个单位，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不便。90 年代以来搜集的徽州文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即搜集了一批归户性文书，颇为珍贵。这些文书从搜集工作开始即注意其归户性。凡原本属于一户的文书，在搜集、收藏、整理等过程中都没有被打乱，保持原貌不变。既给研究者带来了方便，也提高了文书的利用价值。在 90 年代以来搜集的归户性文书中，一户文书有的多达数百份，有的甚至超过千份。这些归户性文书，对于研究宗族社会乃至农村基层社会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

第三，徽州历史文献为中国历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能。

随着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也越来越细。学科分类的细化，有利于专攻和

深入研究，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类社会本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组成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有其特点与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面。如果只进行各个学科的专门研究，忽视学科间的整合性考察，就难以从整体上解释人类社会，而各学科本身的专门研究也难以进一步深入。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倡导在进行各学科专门研究的同时，还要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走多学科相结合之路。这也是 20 世纪学术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如前所述，徽州历史文献的种类繁多，涉及面非常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军事、教育、商业、金融、考古、医学、农学以及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从历史学科的分类来说，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法制史、教育史、军事史、科技史、艺术史等等。这就为中国历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能。往往一种徽州历史文献即涉及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如土地买卖契约，既涉及经济史，又涉及法制史等；宗族文书，既涉及社会史，又涉及经济史、法制史等；诉讼文书，既涉及法制史，又涉及社会史等。这些无疑都为我们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准备了丰富的资料。

关于徽州历史文献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还可举出很多。

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传世典籍，对个人来说，即使皓首，也难以穷尽。学者仅利用典籍文献方面的资料也能写文章、做学问。因而传统国学以文献证文献的研究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市场。徽州历史文献堪称中国历史文化遗存的又一宝藏。徽州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无疑是合乎 20 世纪以来学术发展先进潮流之举。徽学研究的发展，将大大突破传统国学以文献证文献的局限，开辟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Huizhou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Luan Chengxian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Huizhou have a chief characteristic: it not only has abundant copy files, but also owns rich documents of ancient books.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historic culture that it reflects have the feature of locality besides its typicality and universality. Such a quality has determined its important value on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in the same period, probing into social condition at the basic level in ancient China, launching a surpassing-subject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 on. In no doubt,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documents is adapting to learn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By developing the science about Huizhou,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 of state learning ----using the documents to testify the documents---- will be broken greatl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ll open up a new prospect

---

<sup>1</sup>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第 65—6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sup>2</sup>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 2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sup>3</sup>参阅拙著：《明代黄册研究》第三章《明代黄册原本考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sup>4</sup>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sup>5</sup>道光《休宁县志》卷一《风俗·商山书院学田记》。

<sup>6</sup>参阅拙著：《明代黄册研究》第六章《万历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